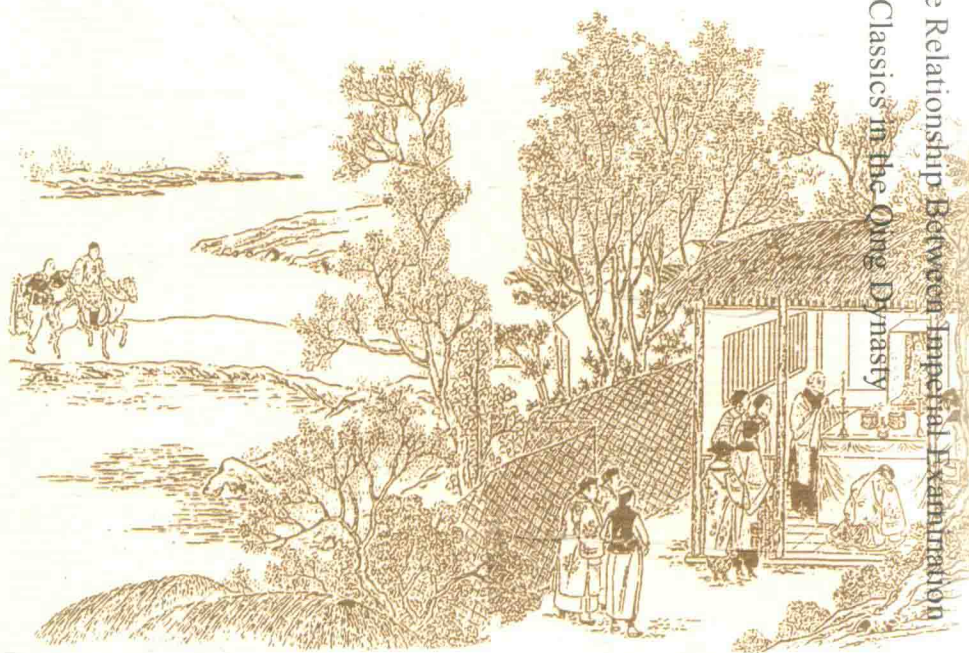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Qing Dynasty



清代科举与

经学关系研究

冯建民 著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Qing Dynasty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教育部青年专项“明清科举与经学衍变的互动关联”（EOA140344）阶段性成果

清代科举与 经学关系研究

冯建民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科举与经学关系研究/冯建民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1

(科举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622-7216-8

I. ①清… II. ①冯… III. ①科举制度—关系—经学—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 D691.3 ② Z126.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0676 号

清代科举与经学关系研究

©冯建民 著

责任编辑:鲁 丽

责任校对:王 炜

封面制作:胡 灿

编辑室:学术出版中心

电话:027-67863220

装帧设计:甘 英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280/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press@mail.ccnu.edu.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王兴平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9.75

版次: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02 千字

定价:39.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序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根基和核心的，历代统治者都将儒学作为维护统治秩序的理论依据，奉儒学为经典，尊孔子为圣人。唐初史臣魏徵、长孙无忌等在《隋书·儒林传序》中说：“儒之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笃父子，正君臣，尚忠节，重仁义，贵廉让，贱贪鄙，开政化之本源，凿生民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虽世或污隆，而斯文不坠，经邦致治，非一时也。涉其流者，无禄而富，怀其道者，无位而尊。”这段话道出了儒学对教化和治国安邦的重要作用，也点出了儒学或经学在社会上的重要性。

儒家经学向来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历代多以经学作为选举取士的标准。汉代以经术取士，隋代建立进士科举制度以后，经学与词章是两个方面的考试内容，自中唐以迄宋末，科场中存在着经术与文学之争。从王安石改革科举试以经义之后，特别是明清科举考八股制义以后，儒家经学在科举考试的内容中占了主导地位。

清代从童生试到乡试、会试，都十分注重儒家经典知识。顺治二年（1645年），颁布《科场条例》规定：乡、会试“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乡会试首场试八股文”。对八股文的写作内容有严格的规定，要求以程朱理学为标准。此后，相继颁布了《钦定四书文》、《御纂四经》、《钦定三礼》等作为八股文写作的规范。为防止考生猜题，乾隆决定从戊申科（乾隆五十年，1785年）乡试开始，先试《易》，然后依次在五科之内考完“五经”，然后裁去二场的论一篇，在“五经”中各出一题，实行“五经”并试制度。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五经”已经轮试一遍之后，开始实行“五经”并试。这是中国科举史上的重大变动，在1300年的科举史上，之前1100余年都是分经考试的，但从此清代所有参加乡会试的举子不仅要精通“四书”，而且要“五经”全通，这一做法一直沿用至清末。

科举具有以考促学的强大动力,在科举考试注重儒学经典的推动下,儒家经学不仅在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而且出现全国读书人认真钻研经典的现象,各种关于儒家经典的阐释和辅导著作层出不穷。备考八股文的书籍汗牛充栋、车载斗量。如小论文、大论文方面,花样迭出,到现在还可以看到数千种古代科举学文献。清中期以后,多数士子对“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了然于胸。“四书”、“五经”为普通中国读书人所熟知,经学得以不断传承和繁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科举的倡导利诱。明清时期流传极广的《神童诗》中便有“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遗子黄金宝,何如教一经”之类的说法。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干和主体,主要是因为具有科举的制度化支撑。可以说,1300年间科举以经学取士,造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读经运动,使古代中国成为一个儒学社会。

与此同时,科举对经学也有相当消极的影响,尤其是明清时期八股文盛行,应试之学大行其道。受功名利禄的驱使,许多人将大量心思用于揣摩“四书”、“五经”可能用来命题的部分,将八股科举视作入仕的敲门砖,甚至只读高头讲章等备考资料和制艺范文而不认真读儒学本经,造成对经学的割裂和曲解,流弊颇甚。对此,科举时代已经有许多人作过痛切的批评。

科举革废与经学式微的过程是同步的。到了晚清,中国在坚船利炮和欧风美雨的冲击之下,整个社会面临着亘古未有的挑战,科举和经学也面临着空前的困境。及至1905年中国废科举后,儒学因失去了制度化支撑和有力保障而迅速衰弱。清朝末年,政府虽然还想尊崇儒经,并在1904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将经学科列为八门学科之首。但1905年废科举后,因失去科举考试的制度保障,经学科有名无实,儒学教育的地位迅速下降。从“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民国时期各种各样对尊孔读经的提倡,到“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20世纪末儒学的复兴,儒学在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跌宕起伏的重大变化。

新世纪以来,儒学或经学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课题,研究成果涉及儒学的方方面面。然而,清代科举与经学关系还是一个尚待系统研究的问题。

博士弟子冯建民在硕士阶段就以《科举制度与文化关系研究》为题完成学位论文,跟随我攻读教育史专业的博士学位,在科举文化方面逐渐聚焦,选取清代科举与经学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很有意义,能够提出不少新见。他刻苦用功,查阅了许多乡会试录等原始资料,从经学史的视野出发,秉持经学衍变与科举变革交相

互动的基本思路,对清代初期、中期、晚期等不同历史阶段经学衍变背景下的科举考试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书中对从分经试士到“五经”并试转变的实证研究,对科举与程朱理学、乾嘉汉学、今文经学等关系的升沉变易的细致探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清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至为密切。从清初、清中叶到清末,科举中经学的考试内容有所变化,儒家文人的学术意见和经学立场在科举答卷中也有一定的挥洒空间。这由策问中的“经策”比较容易看出来,而制艺中的命题和答题倾向,则需花更深的工夫才能深入。曾有日本学者根据明代科举中试“四书”义的出题倾向,看出其与明代思想史发展之间的关联性。从清代制艺出题中也部分反映出清儒的汉学和宋学之争,对此《清代科举与经学关系研究》已有所论述,将来建民博士如果能从“四书”、“五经”中具体命题的选择方面,以及著名人物的科场八股文中分析出经学的微言大义,则可将此专题研究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刘海峰

2015年12月12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清初期科举与经学的关系	(36)
第一节 清初经学的发展	(37)
第二节 清初“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	(53)
第三节 清初科举与经学发展的关系	(63)
第二章 清中期科举与经学的关系	(81)
第一节 清中期文教政策的转向	(82)
第二节 清中期的经学发展状况	(96)
第三节 科举考试与程朱理学	(111)
第四节 科举考试与乾嘉汉学	(126)
第三章 晚清时期科举与经学的关系	(159)
第一节 晚清科举与今文经学的发展	(160)
第二节 科举考试与汉学的衰落、延续	(174)
第三节 科举考试与理学兴衰	(186)

第四章 清代科举试经制度与士人习经	(201)
第一节 分经试士与士人习经	(202)
第二节 “五经”并试与士人习经	(225)
第五章 清代科第世家与经学发展	(237)
第一节 科第世家与经学教育	(238)
第二节 科第世家与家学传承	(252)
结 语	(265)
附 录	(270)
参考文献	(286)
后 记	(305)

Contents

Introduction	(1)
Chapter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36)
1.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37)
2. The Cultural Policy of Respecting Confucianism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53)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63)
Chapter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Middle of Qing Dynasty	(81)
1. The Change of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Policy in the Middle of Qing Dynasty	(82)
2.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onfucian Classics	(96)
3.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Neo-Confucianism	(111)
4.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 Han-Learning School in Qian-Jia Periods	(126)
Chapter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159)
1.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n Modern Script	(160)
2. Imperial Examination & Decline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Han-Learning School	(174)
3. Imperial Examination &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Neo-Confucianism	(186)
Chapter 4 The System of Testing Confucian Classics in Qing Dynasty and Studies by Scholars	(201)
1. Testing Scholars in Specificity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Studies by Scholars	(202)
2. The Testing Scholars in Amalgamate of Confucian Classics	(225)
Chapter 5 The Imperial-Examination Family in Qing Dynas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Classics	(237)
1. The Imperial-Examination Family and the Educ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238)
2. The Imperial-Examination Family and the Learning Handed Down in a Family	(252)
Epilogue	(265)
Appendix	(270)
Reference	(286)
Postscript	(305)

绪论

经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为中国传统学术之最大一宗，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始，两千余年长期处于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在中国经学绵延不断而又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清代经学可以说是处于一个辉煌璀璨的重要时期。“国朝诸事不及古，惟经学一门，超轶唐、汉，为一代绝业。”^①从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兴起，到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清初名儒的涌现，拉开了清代经学辉煌发展的序幕。他们提倡经世致用、崇实黜虚、博通经史，推动了清初经学的复兴。到清代中期，经学发展又步入了一个全面清理、总结的时代，以考据为特征的乾嘉汉学蔚然兴起，以《四库全书》为标志的各种图书相继编纂。嘉、道之交，国势衰败，内外忧困，封建统治危机四伏。今文经学在常州今文学派的积淀下，顺势而兴，沉浸于名物考证的乾嘉汉学则走向衰落，而维系统治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因再度受到统治者重视，在咸同时期实现“中兴”。但伴随着中国近代化步伐的加快和内外忧困的加剧，传统的儒家经学在光绪朝中期之后，迅速走向衰败。

清军入关之后，为稳定民心，笼络知识分子，统治阶级便沿袭前明制度，开科考试。同时，也根据自身统治的需要，对考试制度进行了改革与完善。清初的科举考试，虽然在制度上维持了明代的原貌，却屡有修补。清代中期的科举，则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即将首场“五经”文的考查放置到第二场，而在首场“四书”文之后则增加五言八韵诗一首。士子专习一经应试的规定也改为了“五经”各出一题并试。鸦片战争之后，科举考试因无法满足培养实用人才

^①（清）廖平：《知圣篇·卷上》，见李耀仙主编《廖平学术论著选集》（一），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203页。

的需求而一再受到仁人志士的批驳与修正，开启了晚清改革的步伐，设立了算学科、经济特科等科目，将西学引入科考之中，而维新派更是直接导演和促进了“废八股、改策论”的制度改革。但是在欧风美雨的强劲摧残和清廷统治内外忧患的加剧下，清廷最终被迫诏令停止运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

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异常密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文化孕育了制度，而同时，制度也造就了文化。一方面，科举制度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从中国选官制度发展来看，科举制度文化是古代大一统观念与尚贤思想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演化的产物。”^①另一方面，科举制度又对以经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起到了重大的塑造作用。由此可知，清代的科举制度与经学之间必然存在着互相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而想要去揭示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必须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这便是本研究所力图完成的任务。绪论作为研究的“拔锚起航”，必须要为本研究奠定一定的理论和文献基础。因此，在绪论一章，首先要对“科举制度与经学”这两大主体的关系进行解说，从宏观上把握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其次要对本研究的价值、状况进行阐释与述评，最后还要对本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予以介绍。

一、科举与经学的互动关联

在论述科举与经学的关系之前，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经学的内涵及其发展的基本形态。

所谓经学，就是指诠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儿宽传》：“儿宽，千乘人也，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见上（汉武帝），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擢为中大夫，迁左内史。”^②而经学政治地位的确立，则是始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经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从而使得儒家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备受尊荣。当时，西汉被树立为“经”的主要是儒家的《诗》、《书》、《易》、

① 张亚群：《从中国传统文化演进看科举考试的起源》，见刘昕等主编《中国考试史专题论文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583页。

② 《汉》班固：《汉书》卷五十八《儿宽传》，（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29页。

《礼》、《春秋》，即常说的“五经”。但后来由于崇尚孔子，以“孝”治天下，便将《论语》和《孝经》与“五经”并列，合称“七经”。到了唐代，又从《春秋》、《礼》中各分出“三传”、“三礼”，与《诗》、《书》、《易》三经并称为“九经”。到北宋，于“九经”外，又增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①，于是“十三经之名，遂一定而不可复易矣”^②。

经学自西汉确立之后，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繁衍迭变，除了“经”的数目不断变化之外，由于治经的方法殊异，又可分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宋学三大派别^③。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阐发微言大义，属于西汉的今文经学。今文经学由于根据政治统治的需要阐发义理，所以在西汉十分盛行，也被立于学官。但到西汉末年，于鲁王孔宅的夹壁中发现了数十篇用古籀文字书写的经籍，为了与通行的今文经籍相区别，而称之为“古文经”。古文经学诞生之后，便逐渐与今文经学发生矛盾和冲突，且愈演愈烈。东汉末年的古文经学大家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著书立说，门徒众多，在与今文经学的斗争中取得了绝对的优势，两派之间的斗争也宣告结束。随之经学的斗争便转入古文经学内部派别的斗争，即郑学与王学的斗争。王学的创始人是三国时期魏国的古文经学家王肃，他遍注群经，与郑学对立。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经学以郑玄的学说为主，兼采老庄玄学，而北朝经学则墨守东汉旧说，重师法家法。两者相比，北朝经学落后于南朝经学。故《隋书·儒林传序》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④隋统一之后，南北两学趋于统一，尤其是到唐朝时，唐太宗命孔颖达等纂定《五经正义》，标志着南北经学归于一统。但到唐中

① 参见（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页。

②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陈居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③ 也有将经学分为汉学、宋学两大派的，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经部总叙》中所指出的“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考据学家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阮元的《国史儒林传序》等也持这种观点。但是，由于他们是站在考据学的立场，固守东汉的古文经学，因此他们所说的“汉学”仅指东汉古文经学，并不包括西汉今文经学。此外，刘师培在《经学教科书》序例中按时代的先后，将经学分成四派：“大抵两汉为一派，三国至隋、唐为一派，宋、元、明为一派，近儒别为一派。”（见刘师培：《经学教科书》，陈居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④（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七十五，《列传》第四十《儒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06页。

期，啖助以及赵匡等人说经不依传注，提倡直抒胸臆，开“疑经辨经”之风气，成为宋学的先声。到北宋中期，标新立异，破除传统，己意说经已经成为一种风尚。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等。而理学内部又有程朱之学和陆王心学的争斗，至明代中后期，陆王心学大为兴盛，大肆诋毁程朱理学。进入清代之后，清初在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前明遗儒的倡导之下，“实学”思潮兴盛，将明亡之罪归于王阳明“心学”的空谈心性，而清初统治者在推行“尊儒重道”的文化政策下，推崇程朱理学；至清代中期，以考证经史、名物典章为特征的“汉学”又大为兴盛，而理学则相对衰落；到了晚清时期，今文经学又在经世思潮的推动下走向兴盛，而理学因其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统治功能，重获优宠，再度兴盛；清末，由于时局维艰，西学涌入，传统的经学因无力回应社会之现实而日益遭受世人厌弃，由此衰败下去。

总之，经学在历史演变中，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和自身发展的逻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发展状况，呈现出跌宕起伏的发展趋势。在同一时期，往往存在不同的经学流派互有攻伐。因此，要想了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就必须厘清经学的发展历程。

究竟科举与经学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呢？还是一方决定另一方呢？目前学界对科举与经学的关系的讨论，谈得较多的是科举对经学发展的单向度关系，即科举对经学发展的影响与作用。而在论述模式上，也基本采用“积极与消极”的“两分法”范式。从历史纵向上看，很多论者认为：明清之前的科举，对经学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而明清科举，由于八股文形式的呆板和僵化，则对经学的发展有严重的阻碍作用。这一论述模式和基本的判断，几乎已经成为“定论”。笔者认为，单向度的谈论科举与经学的关系只是一种定性的认识，并没有全面反映出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再者，将科举对经学的影响简单地定性为“积极与消极”，不仅掩盖了科举对经学发展的多维度影响，而且以明清为历史分界，较为武断，也缺乏充分的历史论证。之所以会有如此的“定论”，其根源便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科举的评价，感性大于理性，缺乏客观、全面的认识与了解。

科举与经学的关系最为明显的应该是，经学一直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经学的主要载体是儒家经籍，记载着历代先圣先贤的学说与言论，但在先秦时期，经籍的范围并非专指儒家经书，在诸子百家的书中，道家的《道德经》、墨

家的《墨子》、医家的《黄帝内经》都称为“经”，就连当时的兵书也有被称作“经”的。但是随着儒家学说独尊地位的确立，“经”的范围便被缩小至儒家典籍，随之，“经学”也被界定为阐释儒家典籍的学问。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曾言道：“自汉武帝用董仲舒之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于是中国大部分之思想统一于儒，而儒家之学，又确定为经学。”^①而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西汉确立的“举贤良”、“举孝廉”的察举制度，更是开创了以儒家经学选拔官员的新纪元，这标志着经学与选官制度联姻的肇始。随着儒家经学的日益传播与影响扩大，经学在选官中的比重也日益提高。东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左雄建议：“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史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②这里的“家法”指的便是儒家经术。到了南北朝时期，以经取士更是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与使用。据《梁书·武帝纪》载，天监四年（505年），梁武帝下诏：“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③而天监八年（509年）又诏令：“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④陈朝取代梁朝之后，仿梁制，继续采用明经射策来选拔官员，并且给予经学生未及三十可策试及第入仕的政策优惠。北魏时期，尊儒重经，孝文帝太和二年（478年）六月，诏令：“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救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⑤这些都为即将诞生的科举制施行“以经取士”奠定了基础。

隋唐以降，为维护封建统治，巩固政权，儒学再次被尊崇。唐朝统治者认为经术可以成为维护统治秩序的理论依据，“经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谳识成败……知父子君臣之道，识古今鉴戒之规，经史为先，斯乃急务”^⑥。唐太宗更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85页。

②（南北朝）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一《左周黄列传第五十一》，（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20页。

③（唐）姚思廉：《梁书》卷二，《本纪》第二《武帝中》，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1页。

④（唐）姚思廉：《梁书》卷二，《本纪》第二《武帝中》，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9页。

⑤（晋）陈寿：《三国志》卷三《魏书三》，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1页。

⑥（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十九，《列传》第三十九《姚璿》，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07页。

是“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学生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①。同时，针对唐初南北经学不统一，释经混乱的状况，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命孔颖达主持编撰五经义疏，即《五经正义》，颁于学官，定为科举考试的重要依据和标准答案。“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② 唐代科举，最主要的是明经、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查儒家典籍。唐代将儒家九部典籍分为大经、中经、小经三类，“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③。宋代统治者继续施行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提高儒家经学的地位，规定选拔人才“须通经义，遵周、孔之教”^④。宋真宗还特命邢昺、孙奭等人校订《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七经”，到南宋光宗时，在“十二经”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孟子》，形成“十三经”。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改革科举，罢诗赋、帖经、墨义等考试项目，将明经诸科罢去，只保留进士一科，命士人在《易》、《诗》、《书》、《周礼》、《礼记》中各专治一经，兼学《论语》、《孟子》，并且颁布自己所著的《三经新义》，作为科举考试的专用教材和标准答案。王安石的科举改革，使久已失衡的取士“天平”一下子从文学的一端偏向于经学的一端。但经学与文学的较量因党争而时有反复。直到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正式恢复科举取士，主张以经义作为考试内容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李孟建议：“今欲兴天下之贤能，如以科举取之，犹胜于多门而进。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乃可得真材也。”^⑤ 仁宗接受诸大臣以经义取士的建议，同年下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

①（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列传》第一百三十九《儒学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41页。

②（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7页。

③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四，《志》三十四《选举志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62页。

④（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十二《太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⑤（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仁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2页。

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① 元代科举以经义取士，“可以说几百年来有关经术与文学之争，最终基本上是以经术派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从此直至清朝末年，科举皆以经义为主要考试内容”^②。

可见，从西汉察举制开始，经学便与选官制度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到科举制诞生之后，更加密切。这也充分说明了，“科举制是儒家制度化的最为核心的制度设计”，同时，“科举制是一种以对于儒家知识和观念的了解程度作为选择标准的选官制度”^③。儒家经学也正是借助这一权威性的制度设计，长久保持其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

科举与经学的关系的另一个表现在于，经学衍变制约着科举考试的变革。经学从西汉确立正统地位之后，根据政治统治的现实需要和经学自身演变的规律，繁衍迭变，时而保守，时而活跃，时而反省，时而创新。隋唐时期，南北经学互有不同，师说不一，释经缺乏统一标准。唐太宗也正是基于魏晋南北朝以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的情况，“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④。高宗永徽年间，又陆续修纂了《周礼义疏》、《仪礼义疏》、《春秋谷梁传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等四部义疏，并且规定在明经科考试中，以“九经”取士。自此以后，《五经正义》与四部义疏便被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经解注本，其影响一直延伸到宋初的科举考试。值得注意的是，从唐中后期，很多儒者便对官方颁布的九部义疏的准确性提出质疑，其中尤为具有代表性的是啖助、赵匡与陆淳等人。

到了北宋初期，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对于唐代章句义疏的批判更为激烈。如欧阳修在《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讖纬札子》中言道：“士之所本，在乎六经。而自暴秦焚书，圣道中绝……至唐太宗时，始诏名儒撰定九经之疏，号为正义，凡数百篇。自尔以来，著为定论，凡不本正义者谓之异端，则学者之宗师，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载既博，所择不精，多引讖纬之书，以相杂乱，怪奇诡僻，

① 黄时鉴：《通制条格》卷五《学令·科举》，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

② 刘海峰：《科举制与儒学的传承繁衍》，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7~13页。

③ 干春松：《制度儒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④（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列传》第一百三十九《儒学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41页。